

# 走向新市場社會

## ——波蘭尼與中國轉型

郝卿

波蘭尼及其《大轉型》在社會主義中國受歡迎的程度，遠遠不及其對手、新自由主義旗手哈耶克及其著作。而兩人在西方學術界的受重視程度，恰如中國與西方之左派、右派的政治立場正好相反一樣弔詭。

作為疑似馬克思主義者，波蘭尼 (Karl Polanyi，又譯博蘭尼) 及其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以下簡稱《大轉型》) 在社會主義中國受歡迎的程度，遠遠不及其對手、新自由主義旗手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及其著作。而兩人在西方學術界的受重視程度，恰如中國與西方之左派、右派的政治立場正好相反一樣弔詭。雖然波蘭尼近年來在中國政治學界受到了一些熱捧，他的巨著也有了兩個中譯本<sup>①</sup>，但眾多基於「國家—市場—社會」三分結構的簡單到錯誤的概括與解讀，和王紹光總結的由「市場社會」向「社會市場」轉型中「社會市場」概念的寬泛、空洞與隨意性<sup>②</sup>，充分顯示了中國所謂的「波蘭尼熱」並不等同於學界同仁切實地站在了波蘭尼的理論立場，去深入理解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政治與經濟困境之癥結，以及當今中國大轉型所面臨的困境。簡言之，波蘭尼的精神遺產雖然在被我們消費，卻從未對我們產生實質意義。

對於甚麼是波蘭尼所說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有讀者認為是市場社會造成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領域間關係錯位的局面<sup>③</sup>。馮鋼和王紹光則強調，它應是指社會針對經濟乃至社會的全面市場化，而自發產生的旨在自我保護的「反向運動」，以此來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發起反擊；在這種反向運動的作用下，社會發生深刻的變革，是為「大轉型」<sup>④</sup>。本文通過梳理波蘭尼對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核心價值預設及其對社會變遷造成的影響，來分析波蘭尼秉持甚麼樣的研究立場和價值，並以此為參照來反觀今日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中存在的問題與障礙何在。

\* 本文係東南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人文社科基礎扶持基金(創新基金)項目(項目批准號SKCX20120028)的階段性成果。

## 一 哈耶克與波蘭尼：自由主義與非社會主義

《大轉型》既然講述的是二十世紀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十九世紀以來大行其道的古典自由主義便是作者的不言而喻的對手。巧合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⑤與波蘭尼的《大轉型》都是出版於1944年，但觀點卻截然不同。當時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與冷戰序幕漸次拉開，宣揚古典自由主義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 盡領風騷，不提倡自由主義便是政治不正確，因此哈耶克與波蘭尼的人生際遇也相去甚遠。有鑒於哈耶克的學說在中國知識界的暢銷程度和秉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家對古典及新自由主義學說的提倡，中國社會對哈耶克及奧地利學派的如下主張並不陌生：

一、市場秩序是一種自發的秩序，市場的出現是自然而然的，市場是出於個人天性的要求，因而是必然的。

二、市場經濟具有天然的優越性，能讓分散的、自發的個體追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達到社會總體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三、權力與管制都是邪惡，政府不該干預市場，國家干預是通向奴役之路，應讓市場機制不受限制地運作，政府管制愈少愈好，政府不過是「守夜人」。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自由主義的三個基本假設：一、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二、人的逐利性／經濟性，以及人的逐利性與社會總體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三、市場與市場經濟是自然演化而來的。經濟學家韋森曾特別針對波蘭尼《大轉型》中文版的面世撰文，重申他與汪丁丁等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說的支持。他認為市場秩序的自發擴展自然會導致一種封建制的行政控制社會的解體，並自然要求良序的法律制度的生成，而後者又自然要求憲政民主政制以確保其運作⑥。

不過，波蘭尼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人之逐利本性與市場的自發秩序)做了徹底的否定，揭示了自由主義構築的世界的虛假性與殘酷性。如果我們從歐洲轉型歷史與經濟史的角度看，波蘭尼的判斷更為客觀與可信。波蘭尼認為：

一、在人類的動機中，沒有特殊的經濟動機。而自由主義對人的逐利性和「經濟人」的假設，破壞了人的社會性與人的諸多特徵及需求的完整性。市場社會的經濟建立於「自利」觀念之上，這不僅讓自由主義備受詬病，而且自十九世紀以來便伴隨着歐洲國家的全球擴張，給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性後果。

二、市場並非自然演化而來，經濟史顯示「市場乃是政府有意識且激烈干涉之後所產生的結果。它將市場組織加諸社會之上，以達成非經濟之目的」⑦。反倒是因為不斷擴張的市場會影響到重大的社會利益，自然而然地引發了普遍的「集體主義」保護運動。所以，「自律性市場」乃有意為之的產物，政府干涉與社會保護才是自發的行為。

《大轉型》既然講述的是二十世紀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十九世紀以來大行其道的古典自由主義便是作者的不言而喻的對手。巧合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與波蘭尼的《大轉型》都是出版於1944年，但觀點卻截然不同。

三、經濟自由主義絕不等於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反倒時刻需要政府干涉以保證其「自律性市場」的實現。今日人們的偏見是市場制度與政府干預水火不容，非此即彼，但實際上市場運行與政府干涉並非互不兼容。市場制度未建立時，經濟自由主義呼籲政府干涉；市場制度受到社會不同群體利益的衝擊時，經濟自由主義也呼籲政府干涉。可見自由主義只有一個信條，即「自律性市場」，而「通往自由市場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之統一籌劃的干涉主義，而加以打通並保持暢通的」<sup>⑩</sup>。

波蘭尼將市場視為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廣義的社會體的一部分，市場經濟的建立與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反而使得經濟躍居社會之上並成為其主宰：「市場對經濟體制的控制會對社會整體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即視社會為市場的附屬品，而將社會關係嵌含於經濟體制中，而非將經濟行為嵌含在社會關係裏。」<sup>⑪</sup>所以，市場社會包含了兩種對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傾向以擴張市場，以及反向而生的保護主義以防止經濟脫嵌，將經濟從社會中脫嵌的努力必然會遭遇抗拒。十九世紀伴隨着英國工業化的高歌猛進，英國工人階級政治與經濟上的境遇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與政治問題。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歐文 (Robert Owen) 看到了工廠與機器成為人之主宰的危險性，發動成千上萬的機匠、工人與其他勞動群體參與建立一種使人與社會成為自己與機器乃至市場的主宰的制度，是為「歐文運動」(Owenite movement)。在理論上，它是一種工業的宗教，其信徒是工人階級；在實踐上，它是現代工會運動的開端<sup>⑫</sup>。而歐文運動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歐文意識到，如果讓市場經濟按着它自己的法則去發展，必然會產生全面而持久的罪惡。

市場經濟的建立，或者說經濟自由主義的三個基石，都對人類社會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勞動力市場傷害到人，自由貿易傷害到農業，而金本位制則傷害到依靠價格的相對波動而發揮作用的生產組織。正是因為市場經濟會對社會組織中的人性要素與自然要素構成威脅，市場經濟在工業上的驚人成就是以犧牲社會的代價而換來的，所以保護社會的運動也從未停息。波蘭尼強調人類與人類本性(而非私有化、自由化或市場經濟)才是經濟與社會的歸宿與目的，強調人的非經濟性與社會的整體性，是否意味着他與馬克思主義者是站在同一立場上呢？我們需要深入分析波蘭尼對社會主義及其「階級」論的態度。

## 二 社會主義及其狹隘的階級觀

波蘭尼所採取的是社會主義的立場嗎？畢竟在二戰臨近結束、冷戰序幕即將拉開的時刻，與西方自由主義相對立的便是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加上波蘭尼的妻子又因曾是共產黨員而使他們在戰後的生活受盡劫波。波蘭尼認為，本質上來說，「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的先天傾向，這種傾向試圖使自律性市場服膺於民主社會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場。」<sup>⑬</sup>社會主義試圖挽救人與人之間的人

社會主義試圖挽救人與人之間的人性關係，是對晚近歷史劇烈變動的激烈對抗。波蘭尼雖然肯定馬克思哲學所關注的社會的整體性和人的非經濟性本質，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階級理論不僅粗陋，而且極其狹隘。

性關係，是對晚近歷史劇烈變動的激烈對抗。波蘭尼雖然肯定馬克思哲學所關注的社會的整體性和人的非經濟性本質，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階級理論不僅粗陋，而且極其狹隘。

首先，在波蘭尼那裏，馬克思主義的狹隘性表現在它將階級利益局限在其經濟本質之上。馬克思主義雖然推翻了人的經濟性本質，卻推導出人的階級性本質，並將人的經濟屬性作為人的階級屬性的根本決定因素。然而，人類學對不同國家和社會的變遷過程的研究表明，階級的意義主要是社會性的，而非經濟性的<sup>⑩</sup>。從這一點上來說，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有着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從各階級爭奪片面利益的角度來解釋保護主義，還從反動地主階級對政治之影響的角度來解釋農產品關稅，或從工業巨子之汲汲圖利來解釋壟斷性企業之成長，或以商業的興衰來解釋戰爭<sup>⑪</sup>。但波蘭尼提醒道，沒有任何一個純粹以金錢為依歸的利益團體能夠達成保護社會生存這一重大的目的。

其次，階級利益並不能對長期社會演變的過程提供滿意的解釋。任何全面性的變遷必然會對社會的不同部門造成不同影響，於是局部性的利益就成為推動社會、政治變遷之現成工具，所以階級利益毋庸置疑會在社會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階級利益只能對社會之長遠變動提供有限的解釋；波蘭尼強調，階級的命運被社會之需要所決定，遠甚於社會的命運被階級之需要所決定<sup>⑫</sup>。社會演變過程決定着階級本身的存亡，並且特定階級的利益只決定其試圖達成的目標，而並不能決定這種努力是否會成功。因此，不能太過於根據特定階級的經濟利益或狹隘的階級利益來解釋歷史。

一個階級與社會整體的關係，決定了它在這段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新階級對社會和社會群體一般利益的代表之廣度，決定了其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與地位。也就是說，它能否成功取決於除了它本身之外，它能夠為其他各種利益服務的廣度與多樣性。無論有意與否，也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每個社會階級都唯有代表比自己階級之利益更廣泛的利益，才能贏得更大的政治空間，因為「沒有任何粗暴自私的階級能長久處於領導的地位」<sup>⑬</sup>。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波蘭尼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階級的經濟性本質論斷，以及經濟／經濟基礎對人類社會具有決定性的論斷（亦即經濟決定論），持否定態度。

再者，波蘭尼認為，「國家」作為一個社會單位，遠比「階級」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sup>⑭</sup>。在他的筆下，土地的流動性往往造成極大的災害性後果，自由貿易者往往忘記了土地是國家疆土的一部分。隸屬於土地及其資源之完整性的安全防禦條件很多，「如人口的活力，食物供應的多寡，戰略物質的量額與特性，甚至森林的濫伐、土壤的侵蝕及沙塵暴對氣候產生的影響，這些最後都依土地這個因子而定，而沒有一個是因市場之供求機制的。」<sup>⑮</sup>當法西斯在德、意佔上風並向其他國家蔓延時，秉持自由貿易（工人階級）和金本位制（工廠主）的英、法等國在軍事上毫無準備，以致釀成大禍。

出人意料的是，當工人階級發現自由貿易政策會降低食品價格時，他們毫不猶豫地宣布全世界的農民都是反動份子，一個階級私己的利益傷害到整個國

波蘭尼雖然認可馬克思所關注的社會的整體性與人的社會屬性的完整性，卻並不意味着他否定了自由主義政治與經濟理論所立基的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和個體自由的價值。貫穿《大轉型》始終的主題是波蘭尼對人性與自由的關注。

家的利益。更為嚴重的是，社會中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分離，往往導致不同群體利益之間的衝突而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各個競爭的群體分別佔據不同的政治與社會部門，為自身利益而展開激烈的爭奪和鬥爭，群體利益間的衝突最終導致產業結構或國家機構的全面癱瘓，而經濟體系與政治體系的全面癱瘓對社會造成了全面的傷害和威脅<sup>⑩</sup>。因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也是強調階級的經濟性與階級利益的經濟本質、強調不同階級之間的根本性對抗與鬥爭，故而同樣會導致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的對抗與崩潰，而社會的整體性與有機性一旦遭到摧毀，個體自由也就不復存在。

所以，波蘭尼雖然認可馬克思所關注的社會的整體性與人的社會屬性的完整性，卻並不意味着他否定了自由主義政治與經濟理論所立基的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和個體自由的價值。貫穿《大轉型》始終的主題是波蘭尼對人性與自由的關注，作者關注人性的整全性與非經濟性、社會的整體性與有機性，以及在此人性基礎上珍貴的自由。而自由，究其本質而言一定是個體層面上的自由。波蘭尼所說的自由，不是抽象空洞的、剝離了人性和人類共同本性的自由，而是建立在承認政治社會的權力與管制現實的基礎上，建立在經濟價值的人性化基礎上的全面的人的自由。波蘭尼指出，自由主義之謬誤在於，將經濟等同於契約關係，而將契約關係等同於自由，卻放任市場制度的殘酷性和對大多數社會群體的損害<sup>⑪</sup>。

### 三 市場社會與法西斯主義之必然性

人們一般認為，1920年代末出現的法西斯主義是西方社會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政體詭異的敵人，但波蘭尼卻指出，法西斯主義跟市場經濟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市場經濟崩潰的地方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社會在經濟上採行市場體制後才出現的政治現象。原因在於，在十九世紀以前，經濟是社會之有機的一部分，逐利性鮮見，而互惠、再分配與家計原則才是經濟的支配原則，經濟對於社會群體的功能，在於維持個人在群體中的位置，融道德、文化等多種意義於一體。而十九世紀以後，經濟與政治分離，經濟／逐利的原則侵入甚至主宰一切領域，社會群體衝突加劇，終至經濟體系與政治體系全面癱瘓，而喚出法西斯主義<sup>⑫</sup>。

波蘭尼最引人注意的見解是，純粹的「自律性市場」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市場制度要求建立不受干涉的、徹底的生產要素（即勞動力、土地與貨幣）市場，這樣一種市場的運作有摧毀社會的危險，因此在市場制度建立的同時，社會的自保運動即開始——如果不能預防這種制度的建立，至少去干預其自由運作<sup>⑬</sup>。因此，自律性市場不是自發演化而來的，反倒是「集體主義」的社會保護是這一想像之「自律性市場」的自然自發的附屬品。波蘭尼不無幽默地說，管制與市場同時成長，專制政治的問題從一開始就陰魂不散地糾纏着市場經濟；原因無他，市場制度的破壞性所致<sup>⑭</sup>。市場社會的本質，是在制度上將政治領域與

一般認為，1920年代末出現的法西斯主義是西方社會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政體詭異的敵人，但波蘭尼卻指出，法西斯主義跟市場經濟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市場經濟崩潰的地方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社會在經濟上採行市場體制後才出現的政治現象。

經濟領域分離，而且不管伴隨着怎樣的緊張都要維持這種分離，這是破壞性壓力的一個根源<sup>23</sup>。

在波蘭尼筆下，十九世紀的歐文運動和各種民權運動看到了把社會分割為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只以政治行動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不可行性，因為「接受一個分割之經濟領域的存在就蘊涵着承認圖利原則，以及承認利潤是社會中的組織動力」<sup>24</sup>。自由主義片面的人的經濟性與逐利性（以及馬克思主義粗陋狹隘的階級的經濟屬性）論斷、某個群體或階級的一己之私對其他群體和整個社會的傷害，以及更重要的，市場制度的不加約束所導致的群體間的衝突與對抗、社會與國家的分裂，又反過來加劇市場制度對政治與經濟領域上的分離性安排的張力，造成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的全面崩潰。故而波蘭尼說，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各國的「文明被沒有靈魂之制度的盲目行動摧毀了，而這種制度唯一的意圖是物質福利的自動增加」<sup>25</sup>。

市場社會的「自律性市場」想像、人的逐利性和經濟動機論，不僅摧毀所有生命的有機形式而代之以原子化、個體主義式的組織形態，而且使得社會不同部門與群體之間的衝突日漸加劇（城市工人階級與農民、地主、僧侶甚至軍人）。被自由主義或工人階級冠以「反動階級」的保守勢力起到的作用，恰恰是緩解和挽救隨着市場制度的擴展與推進時農村與城市所面臨的全面危機與巨大衝擊，以平衡騷動不安的工人階級的破壞性並保證市場不致陷入混亂狀態。當民主政體納入和包容更多社會群體，而多個社會群體都對政治領域產生重要影響時，干涉與管制市場經濟的需要和迫切性就會空前增加，而不同群體分別憑恃與佔據不同的政治與社會部門展開對抗與利益爭奪，便會對民主政體與市場制度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市場經濟無法正常運轉，才會催生法西斯主義運動，它對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群體間衝突和經濟體系與政治體系的衝突及運作失靈困局的解決方案，是一種「以所有民主主義制度（產業領域的、政治領域的）之清除為代價之市場經濟的改革」<sup>26</sup>。而法西斯主義則證明了將世界和平寄託在自律性市場上的風險性與虛妄性。應該說，英、法、美的綏靖政策和十九世紀以來積極干涉他國政治制度的政策，都源自於自律性市場信念，而非簡單的西方國家的邪惡兇狠。自律性市場對國際秩序的安排，是建立在金本位制和立憲政府基礎上<sup>27</sup>的均勢制（無政府狀態的主權國）。當各國迷信金本位制、貿易自由主義和經濟上的緊密往來能帶來平時，便罔顧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危害，也無力有效合作予以抵制。

中國經濟領域最近三十多年的變化告訴我們，黨國一體的政治體制使得政府憑藉自己的權勢全面參與市場活動，佔盡市場逐利先機，既壟斷所有市場資源，還通過政黨組織強力而嚴密地控制社會各群體，建立了高度選擇性的國家資本主義。

#### 四 中國的轉型：同與不同

中國經濟領域最近三十多年的變化告訴我們，計劃經濟制度的衰敗與瓦解，並不能自然推導出市場經濟的到來。黨國一體的政治體制使得政府憑藉自己的權勢全面參與市場活動，佔盡市場逐利先機，既壟斷所有市場資源，還通

過政黨組織強力而嚴密地控制社會各群體，建立了高度選擇性的國家資本主義。鄭永年認為中國改革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不過是全面的「經濟國有化」<sup>⑳</sup>。朱嘉明認為政府通過改造和利用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工具，而使自己成為各種市場工具與機制的最大受益者和經營者。不僅如此，政府異化為經濟實體：「政府不僅是國家對土地、礦產資源、國有企業和資本所有權的直接代理者，不僅擁有稅收資源和對金融資本的操控力，成為中國財富擴張運動的發動者和受益者，而且集儲蓄、投資和消費主體為一身，成為實在的經濟實體。」<sup>㉑</sup>

這與十九世紀西方自由主義盛行和歐洲各國紛紛確立市場經濟時的狀況相距甚遠，市場制度的殘酷性所引發的社會保護運動旨在保護人、自然與生產組織(如就業機會、收入、工人權益與生產、生活水平等)，並進而保護經濟領域的市場制度能夠充分發揮作用。也就是說，經濟領域的基本原則仍是市場制度，但政府加以干涉跟進，以隨時消除市場制度的破壞作用及這種破壞性對市場經濟的威脅，並盡量把圖利原則限制在經濟領域。波蘭尼所謂的「政府干涉」，跟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中國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範圍、意圖和結果上的不正當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管是十九世紀歐洲國家的保護主義，還是1920年代末因經濟大蕭條而引入的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措施，都不等於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國家與政治全面覆蓋社會與經濟。

中國自1980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非但做不到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所說的市場經濟改革之工具性手段或細枝末節的私有化、自由化<sup>㉒</sup>，反倒是舊的計劃經濟體制應破未破，舊體制的好處蕩然無存而弊病卻仍一應俱全；新的以市場機制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體制欲立未立，且能否在經濟領域真正建立起來尚不明朗，市場制度的好處尚未惠及全社會而弊病卻接踵而至。雖然中國聲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家，中國共產黨能長期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在社會權益保護方面的全面撤退、今天中國經濟的全面國有化與權貴化狀況以及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卻客觀上表明了共產黨不僅前所未有地脫離群眾，且有蛻變成為一小撮獨立且凌駕於社會各群體、各階級之上的權貴集團的趨勢，對社會一般利益之廣度與多樣性的代表性極低，低到與它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稱號恰成反諷。

馬克思主義粗陋、片面的階級觀無論在多大程度上在中國的政治與國家體制上得以落實，今日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現狀客觀上都已表明，無產階級政黨正在變身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和階級，擁有極其狹隘、封閉及自私的特權與經濟利益——就這一點上來說，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而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現狀，反倒忠實而充分地落實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但波蘭尼也已經指明，沒有一個粗暴自私的階級能夠長久處於領導的地位，這比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之論更百顛不破。與自由主義不同，社會主義承認權力與管制的現實與必要性；而與法西斯主義不同，社會主義的目標仍是守持人們的自由。

因此，沿着波蘭尼的思想，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需要長期努力的方向和目標在於以下三方面：

今天中國經濟的全面國有化與權貴化狀況以及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表明了共產黨不僅前所未有地脫離群眾，且有蛻變成為一小撮獨立且凌駕於社會各群體、各階級之上的權貴集團的趨勢，對社會一般利益之廣度與多樣性的代表性極低。

第一，修正自身意識形態中狹隘、粗陋、自私的「經濟人」式的階級觀，還原和維護人的非經濟性、社會性和社會的有機整體性。中國強力推進的城市化和新一輪城鎮化中的強拆強徵和機器不斷碾過人之肉身的悲劇、普通人群的利益永遠要讓位於地方建設與城市建設的執政思路說明，王紹光所認為的中國經濟改革中工人、農民、市民所享受的各種保障<sup>③</sup>也許從未存在過，反倒是種種人為的歧視與平等的障礙普遍存在，跟波蘭尼所說的保護社會實在關係不大。

與十九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一樣，馬克思主義階級觀的殘酷性與破壞性更在於，它會加深與加劇不同社會部門和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對抗與衝突，這種緊張關係對於國家與社會都破壞極大，而社會的整體性比階級之區分更為重要，中國1949至1976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對社會的破壞作用便是最為生動形象的慘痛例證<sup>④</sup>。而自2012年至今的中國黨政執政與宣傳方針的全面收緊也表明，中國共產黨有重新動用傳統的階級論和通過在社會內部劃分「敵我」的政治方式，來應對國內經濟衰退與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統治危機的跡象。因此，波蘭尼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的弊病與後果的洞見，更值得中國人銘記在心。

第二，無論是階級，還是代表階級的政黨，都須對社會不同群體的一般利益具有普遍性的責任擔當，否則它便不足以承擔保護社會生存和主導社會變遷的重任。這既是馬克思所說的「國家的自主性」的正向內涵，也表明領導國家的政黨雖要超越於各個群體（或階級）的一己私利，卻絕不能脫離各個群體而將整個社會的一般利益歸諸一黨所私有，這既不持久，而且對這一政黨與國家的未來都危害極大。

第三，儘管我們只在提及《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時才強調，馬克思的所有哲學的終極關懷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但二十世紀後半葉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對人類尊嚴與自由的踐踏，客觀上使得社會主義聲名狼藉，離極權與專制甚近而距離人性與自由最遠。如果說自由主義之謬誤，在於將經濟等同於契約關係，而將契約關係等同於自由；那麼，社會主義之謬誤，則在於片面強調被壓迫階級的解放與自由而犧牲了社會的有機整體性，又以集體與國家的名義埋葬了它實現所有個體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初心。唯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實踐才能超越其理論與現實的狹隘性，而成為值得許多社會託付群體理想的政治共同體。

國家的作用在於維持與守護個體的自由，這既出自人的天然本性，而且是人類的共通本性。波蘭尼對於人類社會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見解令人警醒，他說：「由於各國之民族性和背景，精神狀態與歷史經歷有無限的多樣性，使得許多國家之盛衰興廢有不同的地方色彩與概括的重要性，然而，世界文明的主要部分仍然有相同的構造。……這種相似性與人類生活之歷史脈絡中的具體事件的功能有關，與共同生活中有時間限制之要素有關。」<sup>⑤</sup>對自由的守持，既是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根本區別，也是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所寄予的希望——社會主義能超越自由主義對人的自由的損害，而這也是中國在未來的政治、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中所應確立的根本目標與價值取向。

自2012年至今的中國黨政執政與宣傳方針的全面收緊表明，中共有重新動用傳統的階級論和通過在社會內部劃分「敵我」的政治方式，來應對國內經濟衰退與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統治危機的跡象。因此，波蘭尼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的弊病與後果的洞見，更值得中國人銘記在心。

### 註釋

① 參見波蘭尼 (Karl Polanyi) 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波蘭尼 (Karl Polanyi) 著，黃樹民譯：《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② 當市場經濟的原則，如等價交換、供求平衡、價格競爭適用於非經濟領域，當所有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必需品都變成商品來交易時便為「市場社會」。有關「社會市場」概念，參見王紹光：《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102。

③ 戴美華：〈我們該如何前進？——簡評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2010年2月26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34fb2d0100hhfu.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34fb2d0100hhfu.html)；劉思坤：〈關注波蘭尼的《大轉型》〉(2008年9月29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8cfac0100awrb.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8cfac0100awrb.html)。

④ 馮鋼：〈「巨變」與民族國家〉(2006年12月22日)，搜狐博客，<http://fgang.blog.sohu.com/26239396.html?act=1166827963012#comment>；王紹光：《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頁46-51。

⑤ 參見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著，王明毅等譯：《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⑥ 韋森：〈就波蘭尼的《大轉型》一書與浙大馮鋼教授的「博客討論」——並兼評錢乘旦教授指導下製作的《大國崛起》〉(2006年12月23日)，搜狐博客，<http://weisen.blog.sohu.com/26405341.html>。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波蘭尼：《巨變》，頁413；252；129；234-37；294-98；388；237；269；269；275；408；318-19；390；423；390-92；341；326；366；298；367；392；352。

㉜ 典型如康德的民主和平論，參見康德 (Immanuel Kant) 著，何兆武譯：《永久和平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㉝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路徑及其走向〉，《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引自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111324428.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111324428.html)。

㉞ 參見朱嘉明：〈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 (一)〉(2013年3月8日)，華爾街日報中文網，<http://cn.wsj.com/gb/20130308/OPN072206.asp?source=UpFeature>。此文後來收入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42-47。

㉟ 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序言〉，載波蘭尼：《巨變》，頁15。

㊱ 王紹光：《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頁99-106。王認為2002年以後中國的社會政策已經扭轉了市場社會的勢頭，這恰與鄭永年、朱嘉明等的判斷相反。

㊲ 如近年來倡導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文化發展方針，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雙百」方針在1956年之所以提出，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針對知識份子的階級政策，使得知識份子無法有效參與到急需文化和技術人才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來。但「雙百」方針僅實行幾個月，中共中央便認定知識份子作為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階級沒有被改造好，意圖陰謀向無產階級奪權，隨之即發動了1957至1959年的反右運動。趙紫陽和龔育之在1986年底鄧小平等老幹部要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即明確指出：「雙百」方針不過是反右時的策略，其基礎是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論」，既無法保障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發展，也不利於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開展。參見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頁413-14；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354。這也充分說明了當前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的指導方針，包容性極差而排斥性極強，其狹隘性甚至不是主要由無產階級或其政黨的階級觀決定，統治集團假借日益無法立足的階級論來捍衛其過於龐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自身反而完全淪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論中本應革除的對象。